

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

—— 一种激进理论

[英] 杰弗·霍奇森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资本主义, 价值和剥削

——一种激进理论

[英] 杰弗·霍奇森 著

于树生 陈东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0 年·北京

Geoff Hodgson
CAPITALISM, VALUE AND EXPLOITATION
A Radical Theory

Martin Robertson & Company Ltd., 1982
根据英国马丁·罗伯逊出版公司 1982 年版译出

ZĪBĚN ZHŪYĪ, JIÀZHÍ HÉ BŌXUÈ

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

——一种激进理论

· [英] 杰弗·霍奇森 著

于树生 陈东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503-5/F·50

1990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6 千
印数 0—3,000 册	印张 8 1/4

定价: 3.15 元

出版说明

杰弗·霍奇森是英国纽加塞尔—泰因工艺学院的经济学首席讲师。他的《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书是西方激进经济学派和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在基础经济理论方面的一部代表作。

在这本书里，作者明确声称他的意图就是试图“借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吸收凯恩斯、卡莱茨基和斯拉法等人的理论，建立一种所谓新的价值理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不依赖于劳动价值论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问题的新概念，即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从结构上看，该书分为四编，共20章。第一编阐述与价值理论有关的基础概念，并对新古典学派进行批判分析，同时论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成本加利润”的处理方法；第二编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所谓的批判。作者以这两编的内容，试图既与新古典学派又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划清界线。第三编主要讲货币及其职能，第四编则概括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全书集中围绕几个基本理论范畴进行论述，如价值论、货币、生产过程、剥削与利润等，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一般性的分析。

这本书涉及当代西方各种经济流派较广，对我们全面了解西方经济理论思潮，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参考价值，因而组译出版，以飨读者。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编 基础

第一章 导论.....	5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价值.....	17
第三章 意识形态与正统经济学.....	31
第四章 商品和商品的效用.....	40
第五章 交换与生产.....	52
第六章 交换价值和成本.....	61

第二编 劳动论

第七章 劳动和交换价值.....	80
第八章 劳动、计算和因果关系.....	91
第九章 联合生产和具体化劳动.....	105
第十章 略论简单商品生产.....	110
第十一章 劳动、价值和财产.....	113

第三编 货币

第十二章 货币和交换.....	124
第十三章 经济思想中的货币.....	139
第十四章 价值和货币均衡.....	150
第十五章 货币和斯拉法体系.....	161

第四编 资本主义生产

第十六章	抽象的和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劳动·····	173
第十七章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	190
第十八章	剥削·····	211
第十九章	关于资本积累的评述·····	227
第二十章	激进政治经济学·····	243
术语汇编	·····	251
文献目录	·····	256
姓名译名对照表	·····	267

前 言

本书旨在提供一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可是，这种分析仅仅在抽象的论述水平上进行。对各种资本主义制度或其历史发展没有进行什么讨论。说得更确切一些，这本书是关于分析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分析工具。但是，并不认为这种抽象的分析就足以使人了解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能够为政治的或者经济的政策提供什么办法。这些办法只能从研究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政治组织中得来。

本书的分析是从经济思想的某种传统流传下来的，并假定对这种传统相当熟悉。这种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人们假定读者熟悉的那些著作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第1卷；庞巴维克与希尔费丁在《卡尔·马克思及其理论体系的结束》（斯威齐编辑）一书中的重要辩论；多布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以及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再则，此项工作受到有关凯恩斯传统作品的影响。附带地，这与近三十年来很有说服力的所谓“凯恩斯学派”传统相反。当然，优秀的著作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现代对凯恩斯的重新评价，出现在莱荣霍夫德的《论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一书中。两位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家在凯恩斯和马克思的著作之间处于不同的地位。他们是琼·罗宾逊和卡莱茨基。罗宾逊的《经济学论文选》和卡莱茨基的作品（参阅 Feiwel, 1975 年）包括了对马克思和凯恩斯两人的讨论，值得一提。假如没有这两位理论家创造性的努力，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就会薄弱得多。

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彻底改革了过去二十年中的经济理论。它对本书有重要影响。然而，斯拉法的单薄的作品很难处置，读者最好先读一下斯蒂德曼的《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该书中不仅有关于斯拉法的相对价格论对马克思的影响的讨论，而且也有关于斯拉法的学说要点的说明。

过去十年中，解释或者叙述马克思思想的书刊激增。而本书并不是这样的一种解说性的著作。然而，对大量著作中遗留下来的属于批评和说明性质的一些重要的和有影响的著作加以注意，也有益处。其中有科莱蒂的《从卢梭到列宁》、利皮的《价值和马克思著作中的自然主义》、以及霍华德和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是最发人深思和中肯的读物。

随着最近几年中马克思学说的盛行，马克思主义方面一些较不出名的著作也重印了。在经济理论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鲁宾的《关于马克思的价值学说的论文》；这是一项重要的和内容丰富的研究，其中对马克思的阐述至今还富有说服力。

然而，本书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还有一些距离，特别是在它否定劳动价值论这一点上。这种否定引起了一些在别处还没有充分讨论过的问题，而据本书作者所知，在科恩(1979年)、埃勒曼(1978年、1980年)、莱文(1977年)以及利皮(1979年)的著作中则除外。

讲一下本书中某些思想的起源，也许有点兴趣。1973—1974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伊恩·斯蒂德曼的指导下，作者从事于对联合生产问题的研究。这引起了学生和导师都想要在一种对价值的定义下发掘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负剩余价值”的可能性。从这一点来说，想要挽救劳动价值论的努力，几乎是无望的，至少在传统的阐述方法中是这样。

1973年12月及此后人们努力应付放弃劳动价值论的情况，

作者心中记忆犹新。这种理论，在逻辑的和科学的立场上必须放弃；然而这样的放弃，表示怀疑所谓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某种剥削的概念以及整个的关于现代社会的阶级观点。再则，对资本积累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看法，必须修改甚至放弃。作者不得不深入研究象“剥削”这种概念的真正意义，这些概念曾经由劳动价值论作过不能使人满意的和重复累赘的说明。关于这方面的著述很少，令人惊异。正统的新古典学派分析的出发点是：假设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世界上可能的最好制度，因此假如竞争的市场统治一切，剥削就不会存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坚持劳动价值论，不觉得需要对剥削性的社会关系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甚至老于世故的著作，例如伊特威尔(1975年)的一篇论文，以及后来莫里希马和卡特福尔斯(1978年)的一本书，在题目中都有“剥削”一词，也只是假定剥削包含某种剩余产品的存在。这种粗鲁的和有些傲慢的对“剥削”一词的解释没有什么说服力。同样的手段也曾对劳动价值论用过；那些作者假定了一种必须证明的东西，而他们只是陈述了一种必须解释的现象的影响。只有对劳动过程的具体研究，象《资本论》第1卷以及布雷弗曼的《劳动和垄断资本》中叙说的那样，才能真正说明此中的关系和作用。

1975年2月，作者曾在伦敦大学的伯克贝克学院提出一篇论文，第一次试图重新系统地阐述资本主义的所谓剥削概念。后来这篇论文曾有两种修订本发表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会议公报》上，并用丹麦文刊载在《北欧政治经济学评论报》上。再后又有一种修订本于1980年登在《科学与社会》上。这本书里关于剥削的阐述是那些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修改。

与一种剥削论的发展同时并进的，还有对货币学说和价值学说的关系的详细阐述。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概念，曾于1976年10

月间在哥本哈根大学和奥胡斯大学提出的一篇论文中提到。这篇论文的修订本将刊登在《澳大利亚经济学论文集》上，本书的第15章以这篇论文里的资料为根据。此外，第8章部分地利用将要在别处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资料。承有关编辑慨允利用这些已经发表过的资料，谨此志谢。

本书中有许多概念曾由作者同别人在谈话中讨论过，并往往受到建设性的批评；也有一些人曾对草稿的某些部分提过有益的意见。在上述这些方面花费过时间和精力，有塞缪尔·鲍尔斯、克里斯琴·格罗思、杰弗·哈考特、巴里·海因兹、简·克里杰尔、大卫·莱文、爱德华·内尔、西奥·尼科尔斯、大卫·珀迪、罗伯特·西蒙兹、塞诺斯·斯库拉斯和伊恩·斯蒂德曼。还有许多其他人，这里无法一一提名；此外还有一些不愿被提名的评判者。对这些人给我的帮助，在此致以热忱的谢意。然而，毋庸明说，其中许多人对于书中采取的态度和方法，抱有不同的意见；书中如有谬误之处，与他们无关。一切由作者自负。

最后，我必须感谢本宁顿学院，它使我能摆脱英国国内的政治活动的引诱，并对我提供了时间和适宜的环境，以便完成此书。尤其应该感谢的是文尼，她耐心地于不知不觉中帮助了一个脾气暴躁的作者。

杰弗·霍奇森

1981年1月，写于本宁顿学院，弗蒙特州，美国。

第一编 基础

第一章 导论

危机恰好存在于这样一个阶段，即老的正在死亡而新的尚未能诞生；在这段空白时期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病态现象。

安东尼奥·格拉姆希：《狱中札记》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现代经济制度的状态之间的关系，要比人们通常所承认的更为密切。之所以建立起古典经济理论这一庞大壮观的体系，并不单纯出于了解真理的愿望；其目的也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竞争和不加限制的自由贸易提供理论上的辩解。那时这门学科不叫“经济学”，而是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后一个词来自希腊文中的 polis（社会机构）、oikos（居民家庭）和 nomos（条令或法律）；究其字面的词意是“有关社会管理的规则”，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家们不只是关心抽象的理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研究工作受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增长和贸易扩展的推动，旨在持续这一经济进程；而他们的理论成果之所以被其同时代人接受，也恰恰在于他们通过严格分析和明确提出措施建议而对那个时代的核心政策性问题有所建树。

有鉴于此，马克思常把自己的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是偶然的了。在《资本论》和其它著作中，马克思不但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错误，而且表示反对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整个方向。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不是简单的技术性的。马克思反对在假定

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是事物的自然秩序这一基础上所作出的分析结论，因此也反对那些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进行简单调整而不承认这种生产方式具有历史的和经济的局限性的政策措施。通过证明资本主义的内在的局限性，马克思针对自己那个时代的正统经济政策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他从作为基础的价值论出发，逐个发展出关于生产、积累、危机的理论。尽管有时并未加以详尽阐述，但他的整个理论显示出一种鲜明的政策立场；对马克思来说，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措施是紧密联系的。

新古典学派

随着新古典学派的出现，在理论上产生了新的分野。19世纪70年代，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及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反对劳动价值论和与之联系着的激进的政治结论。马克思与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如霍格斯金，都曾使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里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剥削。1870年后，新古典学派所做的努力，是要把政治经济学改造成象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19世纪末实证主义哲学的泛滥，为经济思潮中这股新古典主义的逆流提供了现成的方法论。既然纯科学应免除价值判断，那么至少在学科的基础理论中就不应再有标准偏见的容身之地。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泰斗马歇尔甚至成功地为这一学科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政治经济学”被改为“经济学”。人们无疑了解这一新词在词源学意义上的缺陷，但是对其倡议者来说，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强调与令人不舒服的政治界一刀两断。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下一章里将要表明的那样，新古典学派并没有割断与意识形态的连带关系。在他们对其价值判断保持沉默的同时，这些价值标准却在背后起着更为恶劣的作用。与古典经

济理论一样,资本主义市场仍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甚至是永恒不变的。“自由放任”这一粗俗的教义,被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在政治实践方面,新古典学派实质上是主张在经济活动中免除政治和政府的干预。如果说斯密和李嘉图还曾力图使用理论工具来证明市场机制的所谓优越性,那么新古典学派则干脆要人们无条件接受这种优越性。他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但是在一片沉默之中却潜伏着对现状的煞费苦心的辩护。

凯恩斯

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时期的病痛呻吟,打破了理论上的沉寂。马歇尔从前的一位弟子凯恩斯,对正统的经济理论在政治上和实践中的无能为力感到不耐烦了。本世纪20、30年代,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失业所造成的悲惨景况愈演愈烈。到30年代初,世界贸易也崩溃了。而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们在这两个十年中却还在继续鼓吹自己的教条,撑持着最好的对策就是放任自流这一老套套。依据市场自我调节的理论,他们确信市场自身的活动会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的状态。凯恩斯对此表示怀疑。他成功地挖了新古典学派市场理论的墙角,提倡加强政府的干预来调节经济总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的政府都采纳了这一政策,并且多半由于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使资本主义世界暂时免除了发生大萧条的风险。

但是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并没有消失。相反,既是由于凯恩斯的成功,又是由于他的失败,新古典学派又获得了新的活力。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对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框架之内形成接近于充分就业和取得经济增长这样一段时期是有贡献的。尽管加强了政府干预,但仍保留了私人占有制,市场仍是经济活动的主导机制。这种体制的成功,使得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营方

式的信心又增强了。另一方面,凯恩斯的失败在于,虽然在其著作中已经证明市场机制事实上是有缺陷的,但是凯恩斯并没有将这一点同与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不同的价值和生产理论联系起来考虑。在凯恩斯那里有关于货币的理论,但是缺少独创的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换句话说,凯恩斯在理论上留下了一段空隙。

甚至在1946年凯恩斯逝世之前,先前的保守理论就已经去填补这个空档了。凯恩斯在为高级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定政策措施方面取得的成功,表明他的宏观经济分析很难被纳入新古典主义的正统学说中。但是凯恩斯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不同的一般理论,尤其是一种能够取代正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从而表明所谓的“凯恩斯革命”是不彻底的。由此而产生了一种荒唐的局面:在战后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微观经济学部分,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自动趋势;与之相反,同一书的宏观经济学部分讲述的却是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表明在缺少适当的政府开支时会造成失业。

近年来经济学者们越来越感受到这一脱节现象所造成的压力。然而为进一步扩充凯恩斯的学说所作的努力并未能解决这个矛盾。与此同时,另一种做法是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建立在正统的新古典学派理论的基础上,而不是将后者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学派思潮已经重新抬头。这种前凯恩斯正统流派的复活,代表着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股逆流。

新右派

货币主义是新近冒出来的。货币主义者所公开宣扬的是,在货币的供给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这种似有其道理的论调;但是在这种说法的后面隐藏着许多其它的东西。在研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必须限制政府(而

不是限制私人银行和别的货币创造者)的权力,特别是要限制政府的“印刷”钞票的嗜好。极端仇视政府干预经济,这在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言人米尔顿·弗里德曼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有关通货膨胀原因的看起来头头是道的学究式理论,实际上不过是掩护其全面反对公共开支、公有制以及“福利国家”的立场的面具。如按这种理论行事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向后退,即倒退到凯恩斯之前的时代去;他们坚信资本主义的市场活动是包治经济百病的灵丹妙药。伴随着对凯恩斯的权威进行的挑战,在西方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右派势力。

这种对资本主义市场的重新支持与关于这个市场的新古典学派理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样简单的。单从新古典学派的供求分析出发,还很难说能够直接作出诸如市场优越性这类价值判断。但是,看来新古典学派的整个分析只集中在资本主义体制的某些方面而忽略了其它方面;其原因不在于这种分析的前提过于简单化,而是前提本身就存在着偏差。把市场看作一个自我调节的本体这种观念,植根于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机械论和经济宿命论。按照新古典学派的世界观,运行着的经济就象是一部机器:它的行为都是预先规定好的;尽管其中每个个人可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但是这些选择都是通过效用函数严格按数学规律确定的。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认为政府根本无力改变市场经济长期的实际发展;如果政府横加干预,结果只会使经济活动偏离其自身的最佳进程。

经济理论的危机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碰到的第一次危机,主要是由于其经济政策在恢复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惨败而引起的。现在,我们又面临着第二次危机。70年代资本

主义世界越积越多的经济问题,使凯恩斯的药方失灵了,凯恩斯被推崇的时代正在急速地宣告结束。发达国家里英国的经济状况最糟,因而该时代的终结也最为明显。要注意到,对发达国家面临的十分令人头痛的经济困境,凯恩斯的“需求管理”从来就不是一种治本的办法。正如人们现在已经广泛意识到的,凯恩斯的理论已经濒于死亡。

同样,越来越清楚,新右派的理论并不能起到合适的替代作用。70年代末,不管是以时兴的纯粹派还是以激进的反凯恩斯面目出现的新古典学派,都在令人尊敬的象牙之塔里陷于穷途末路。不论在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领导下的英国还是在美国,事情也十分清楚:货币主义的政策加上对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可起回天之力的盲目信仰,对解脱困境毫无作用;这一点同样在英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与20年代和30年代新古典学派的情况一样,这些理论一旦面临实际的考验便都一败涂地。

在世界各地,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亿万人饱尝失业之苦。必须承认,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不容易的。但是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经济学家们也决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经济理论固然不可能成为医治经济和社会疾苦的万灵药方,但毕竟还是发挥着作用。凯恩斯曾写道:“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其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这一段话经常被经济学家们甚至那些从事最抽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们所引用,目的是表明他们做的工作是有用。无论如何,凯恩斯的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凯恩斯低估了既得利益的作用这一点却未免显得过于草率。举例来说,他提出的那套政策建议之所以被采纳,其根由恐怕并非因为当权者们为其《通论》中的

论证和结论所折服；它们之所以被采用主要是由于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认为采用他的政策最有可能使资本生存下去，从而保住占有财产的上等人的既得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近来出于商业利益而抛弃凯恩斯，且用货币紧缩来向新右派求爱调情的做法，并不符合他们最好的长期和短期利益。许多掌权者是从空中听取意见，拙劣作者获得奖赏，并得以在电视的黄金播放时间出头露面来向公众施加影响。

经济理论，尤其是这些理论对指导行动的作用一般都被夸大了；但是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的进展，的确都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缺少标新立异的精神有利又有弊，通常是弊多利少。在凯恩斯的著作中缺少我们可称之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或可替代新古典学说的价值和生产理论。这种情况限制了被夸大吹嘘为“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使其敌手的反扑轻而易举，并帮助维持了关于奇妙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神话。现在经济理论的危机就在于面对经济现实中种种折磨人的尖锐问题，老的理论过时了，而新的理论却尚未诞生。

理论上新的探索

新的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事实上，通常出现的所谓新东西，一般都是掺杂着各种现有的东西的混合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应过分强调所谓的“新颖”和“首创性”。寻求新的理论方法，必须从对过去各种理论的重新估价出发。正因如此，在70年代经济思想史再度成为热门的研究课题并不是偶然的。人们不但对本世纪的而且对上一世纪的经济学家们都给予极大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并不打算写成一部经济思想史；它之所以部分地涉猎这一领域，目的全在于从老的理论中寻找建立新理论的起点。作者本人既不为这里对过去的经济学者包括马克思所做